



复旦发展与政策评论 / 第九辑

人口、资源与 环境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与政策评论 / 第九辑

赵德余 主编

人口、资源与 环境政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赵德余主编.—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复旦发展与政策评论)

ISBN 978-7-208-15532-9

I. ①人… II. ①赵… III. ①可持续性发展-中国-文集 IV. ①X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50368 号

责任编辑 刘林心

封面设计 傅惟本

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

赵德余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13
插 页 4
字 数 162,000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532-9/D·3309
定 价 45.00 元



复旦发展与政策评论 第九辑

人口、资源与
环境政策

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

编委名单（以姓氏拼音字母为序）

曹正伟 陈 洁 陈 钊 杜 宇 顾丽梅 胡 湛 梁同贵 陆 铭
任 远 苏忠鑫 滕五晓 吴开亚 张涛甫 赵德余 朱 勤

本期主编： 赵德余

本辑序言

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我们的研究生专业设置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试图将这三个问题在教学和科研中融合起来。直观地看，在过去 4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的确造成了各种土地和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以及由此产生了许多地方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不过，这种情形也同时导致了生态产品的稀缺性。经济发展过程中公众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其强化对环境质量和生态产品的需求创造了条件，于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开始从人口规模扩张—经济开发—资源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之中逐渐摆脱出来，试图开启新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即环境和生态产品需求和价值的上升无疑提高了整个社会对生态空间和自然资源环境的保护意识，于是，生态空间以及其相应的土地资源的保护水平也随之增强，从而有助于环境和生态产品供给的增加，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的生态环境产品的需求。这种新的发展循环模式特别突出了绿色和环境保护价值的重要性，其环境价值在政治议程上的优先序由领导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和推广而不断地强化，并且逐步地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同和支持。

如何开展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的研究？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在复旦大学，这个问题的研究资源分布在很多个部门，如经济学院、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以及环境科学系。而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这个理论经济学之下的二级学科并没有设置在经济学院，而是在我们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这显然有利于和公共政策学

院的社会学、人口学、政策科学等多个学科发展进行整合。

应该指出,在规范的价值讨论中,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其实都可以提供与新型发展理念相关的知识和方法,人口、资源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解释性构造本身是一个系统工程,体现在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领域。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甚至是社会政策咨询服务过程中,我们做人资环相关的许多研究工作都会涉及价值观念之间冲突和紧张的问题。例如我们在解读“两山”思想时,其背后折射的价值紧张正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紧张关系,这就是一种关于人和自然之间的“和谐”价值体现,也是关于绿色环境保护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之间哪一个目标具有优先重要性的正义或“公正”的价值问题。在过去,那种“先发展后治理”的功利主义发展理念在新时代已经和新的核心价值观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五个文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的理念不一致了,即在新时代,人和自然的和谐价值必须得到优先考虑,而“五个文明”和“两山”思想都进一步强化了资源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性。将这种“美丽乡村、美丽中国”的理念不仅传导和影响到各种政策议题在政治议程中的讨论,而且通过宣传教育等各种灵活多样的形势传播给公众,公众对这种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也必然逐步地得以深化,以弱化和降低有关环境资源保护政策实施的阻力。

从政策决策过程来看,无论是人口生育政策,还是环境保护或绿色发展政策是如何发生转变的,不同的价值目标背后的压力和支持力量在政策议程设置与决策过程的冲突和紧张是如何调解的,政策议程的触发机制是什么,政策变迁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对政策问题性质的界定以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这些政策过程视角的研究明显缺乏或不足。这反映了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的跨学科视角还比较薄弱,政策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有待广泛地运用到相关政策的分析之中。

就环境保护或绿色发展政策而言,由于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各种形式的政策工具被开发出来并在实践中得到

广泛的运用。以自然资源管理和污染控制为例,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谱系是一目了然的。根据政策矩阵的划分,可以大体上看到存在10多种类型的具体政策工具,如(1)自愿性的货币化工具:市场与非营利组织。市场显然是自然资源的一种可供选择的配置方式,尤其是对那些货币化程度高的且权利界定清楚的私有自然资源,市场机制可以保证交易的自愿性和效率。(2)自愿性的非货币化工具:自愿的协议与信息劝诫。非营利性环境保护组织提供的环保服务有时也是非货币化的工具,尤其是经常与自愿协议和信息劝诫结合起来运作。(3)混合性的非货币化工具:强烈的信息和劝诫。由于潜在的污染者对污染相关的问题比政策共同体的成员具有更多的信息,政府部门鼓励媒体或公众对有关污染的信息曝光,并发布污染信息预警和警告,可以对潜在污染者起到威慑作用。(4)混合性的货币化工具:税收、使用费、补贴和产权拍卖。其中,税收或收费工具在资源环境保护方面的运用非常广泛,包括水费、门票、捕鱼执照和伐木费、废弃物费、汽油税、能源税和工业污染费等,而补贴工具的使用包括对减少污染或捕鱼的补贴以及农业减免税、对减少能源消耗的补贴等。产权拍卖涉及对排污总量控制及其排污权的拍卖,还有特殊自然资源的使用开采权的拍卖等。(5)强制性的货币化工具:公共企业。一般而言,公共企业作为政策工具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也同时易于货币化其运作成本和收益。公共企业可以直接介入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任何领域,如对沙漠化和污染的治理、生态多样化的保护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等。(6)强制性的非货币化工具:规制与直接供给。关于自然资源 and 环境保护的规制政策工具运用也非常广泛,涉及许多方面,如对行为和权利的规制和对资源环境质量的规制,甚至包括有关分区规划等。

通过挖掘自然资源管理问题的多重属性来对政策工具进行分类,有助于加深和细化对政策工具性质以及对环境保护等政策目标的有效性的理解。但是,对政策工具概念类型的精练化努力是有限度的,过度地增加政策工具的属性维度会增加分析的困难。如果我

们以中国近年来实施的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政策作为研究案例,试图思考和研究的问题将涉及:中国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政策目标是否仅仅是为了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口和重要抓手的工具,如何选择和设计节能降耗和保护环境的政策工具,该政策制定的政治过程是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学特征,该政策相关的系列政策工具类型将会涉及哪些利益相关方,其不同政策工具实施机制是什么,对于政策工具实施过程中的利益受损方是否存在补偿机制或者其行为激励会发生哪些变化,如何评估和比较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绩效差异?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涉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政策过程理论以及政策系统动力学等多学科。

近年来,我们也在不断推动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领域的问题展开对话和讨论,尤其是在教学科研开展合作。在日常的科研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如在教学中,“政策过程分析”课堂上结合每年的两会,选择两会期间各种政策议题,鼓励学生讨论不同政策议题在媒体和政治议程上的优先序或相对重要性,分析政策问题的性质及其严重性。针对政府出台的各项改革政策措施,鼓励同学对不同的政策干预工具进行辩论,识别不同政策工具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鼓励学生结合人口、资源与环境领域相关的最新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进行政策科学建模,从理论和经验上进行检验。如关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思想论断,在课堂上和学生一起运用社会政策的资产模型和系统动力学模型对这个命题构造了多种解释模式,并结合对浙江省安吉县的白茶、毛竹产业和旅游产业等具体案例进行“两山”思想的论证、解释和检验,让学生深刻理解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政策文件中的很多论断或命题所具有的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或者政策科学的含义,以及通过经验案例和数据资料进行实证分析的重要意义。

不过,非常遗憾的是,尽管这些年我一直关注着人口、资源与环境领域的研究进展,能够感觉到人口研究、资源经济学和环境管理

等各个领域研究之间存在的割裂感,缺乏运用跨学科的方法在人口、资源与环境不同领域的系统整合研究,但是事实上发现如何走进这个领域并且形成强有力的稳定的研究团队还是有些困难。期待本辑的几组文章能够推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赵德余

2018年9月

目 录

本辑序言	1
人口生育政策	
我国乡城流动人口生育间隔年数别生育率的分析 /梁同贵	3
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以动态政策执行过程为视角/艾贺玲	23
人口结构与老年健康	
上海市实有人口状况与变动分析:2010—2016年 /朱 勤	41
老年健康的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苏忠鑫	54
资源政策与配置效率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上海市工业环境效率静态分析及其 政策解释 /吴开亚	75
煤炭开采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胁迫阈值研究 ——来自1990—2016年我国典型煤炭城市淮北市的 经验证据 /万伦来 李康玮 卢晓倩 杨 峻	97
上海生态农业的内涵、特征及其发展的瓶颈问题与对策 /曹正伟 张宇泉 徐 浩 锡林图雅 侯绍靖 廖培添	111
环境评估与环境治理	
基于社区的规划环评公众参与研究——以上海H工业区为例 /王育平 王 珏 何 佳 包存宽	141
小流域水污染治理的政策网络分析 ——以福建西塔溪流域为例 /詹礼辉 赵德余	159
政策访谈与对话	
学者与基层干部的对话:乡村环境整治与发展模式——安吉县 H村案例 /赵德余 裘松伟 王 甲 朱 勤 周新宏	173

人口生育政策

我国乡城流动人口生育间隔年数别 生育率的分析

梁同贵*

[摘要] 常用的生育率指标在研究我国迁移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存在着缺陷,而生育间隔年数别生育率可以精确地测量迁移流动人口的生育水平,也可以有效地消除在比较乡城流动人口与农村本地人口生育水平时由于所受时期进度效应的不同而导致的误差。对 CFPS2010 数据与 2014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结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推断。剔除乡城流动的选择性后,研究发现各孩次生育均在流入地的乡城流动人口与一孩生育在流出地的乡城流动人口的二孩生育率均低于农村本地人口,三孩生育率在有些二孩生育年代上高于农村本地人口,这很有可能是 2014 年流动监测样本搜集了过多近期生育案例所致。一孩、二孩生育均在流出地的乡城流动人口的三孩生育率低于农村本地人口。总体来看,人口的乡城流动与生育水平降低之间有着因果影响关系。

[关键词] 乡城流动人口;农村本地人口;倾向值得分匹配;生育间隔年数别生育率

* 华东政法大学社会发展学院。

一、研究背景

我国有关迁移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主流研究均得出了迁移流动降低了生育水平的结论(杨子慧,1991;周祖根,1995; Goldstein & Goldstein, 1997; 陈卫、吴丽丽,2006;郭志刚,2010;李丁、郭志刚,2014;周皓,2015)。但本文认为,在生育率指标选取这一关键性问题上仍存在着不足。

学界通常根据普查前一年的生育情况来计算“总和生育率”、“分孩次总和生育率”、“一般生育率”,以及进行 logistic 回归,以此作为“时期生育水平指标”来分析,但“处于流动状态的人口倾向于推迟生育,而推迟生育产生的时期进度效应会显著地降低当年的总和生育率”(郭志刚,2010)。理论上,婚育年龄的推迟使得总和生育率这一时期生育水平指标并不能反映流动人口真实的终身生育水平,而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所受时期进度效应影响的差异,使得时期总和生育率在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比较时又会产生误差。不仅仅是总和生育率,根据普查前一年的生育情况来计算的其他生育率指标,都将受到时期进度效应影响带来的误差。即便是根据普查年份“是否生育”来进行 logistic 回归仍然不能剔除两类人口所受时期进度效应的影响,因为,在流动人口所受时期进度效应较大的情况下,流动人口普查年份生育的孩子数量同样会减少,在增加了几个控制变量后,流动人口生育的优势比低于非流动人口的结论也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两者生育水平上的差异。

流动推迟生育可以用中断理论(Disruption theory)来解释,中断理论认为迁移将会暂时中断生育,包括择偶的中断、夫妻分房、迁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迁移后的压力。但中断理论并不考察移民在长时间的生育率。事实上,国外一些研究也指出通常使用的时期总和生育率(TFR)在研究移民生育率上并不是一个可靠的指标(Andersson, 2004; Sobotka, 2008; Robards & Berrington, 2016)。安德森

(Andersson, 2004)在研究瑞典移民的生育模式时提道:“基本而言,总和生育率是对队列生育率的测量,当尝试着去对潜在的生育动力做调查时,它将变得不再适用,如不能测量日历翻过一段时间或迁移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的生育动态。对于来自国外的且来源国范围不断扩大的育龄妇女,用此指标去理解生育动力便不准确。”Sobotka(2008)认为时期总和生育率在反映国外移民中在迁入地居留时间较短的那部分妇女的生育水平时,这种潜在的失真也就更为严重。因此,时期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够检验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居住一段时间后,究竟是追赶理论(catch-up theory)还是融合理论(assimilation theory)在终身生育水平上起了作用。追赶理论认为迁移人口原迁出地的生育水平较高,他们的生育意愿同样保持在较高的水平,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他们适应了迁入地的生活,生育孩子变得容易,可能会对中断引起生育率下降有一个补偿的行为,或者“追赶行为”(catch-up behavior),生育水平相应地也会提高。融合理论恰恰相反,认为迁移后移民的生育态度与生育行为将会为适应迁入地的社会经济、文化与物质环境而发生改变。因此乡城间的移民比起农村原住民将会降低生育水平,并在现代化媒介的作用下适应城镇较低的生育水平。仅具有基本的社会经济基础的城镇移民需要通过获取城镇居住者的角色特征来适应城镇的生活,角色的转变增加了他们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他们逐渐开始变得像迁入地的居民那样少生育。赫维特(Hervitz, 1985)也曾指出中断理论与融合理论关注的迁移对生育率影响作用的时间点不同,这也将导致不同的结论。福特(Ford, 1990)的研究结果发现美国移民刚到美国时生育水平较高,这或许是出于对迁移而导致的结婚与生育延迟的一种补偿。但过了一段时间,移民的生育水平降低。并进一步强调,“在不考虑移民迁入地居住时间的情况下简单计算的生育水平,据此得出迁移对生育水平影响的结论可能会被误导”。时期总和生育率在移民生育水平研究上的缺陷要求寻找新的指标或者研究方法。

也有学者采用“曾生子女数”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分年龄的平均生育子女数”等作为累计生育水平指标来分析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生育水平差异,但这些研究中,由于不能明确调查时点上流动人口曾生子女有哪些是在流动前生育还是在流动后生育,如果仅仅因为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是流动人口,就将其曾生子女数算作一个流动人口样本的生育水平并与非流动人口进行比较,这样的数值计算与比较显然是值得商榷的。甚至“曾生子女数”能否作为衡量流动人口生育水平的指标都是有待考究的,因为存在着一种极可能的情况就是调查时点的流动人口是在结束生育后才开始流动的,在流入地不会再生育,从实际意义上,他们所拥有的子女数与其流动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另外,“曾生子女数”指标并没有区分流动与孩子生育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所以人口流动对生育水平影响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还未得到证实。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从2014年流动监测数据库中选取乡城流动人口、从2010年CFPS数据库中选取农村本地人口,在基于倾向值得分匹配删除掉乡城流动的选择性后,采用生育间隔年数别生育率(birth-interval-specific fertility rate)分析了两者的生育水平的差异,并再次考察人口的迁移流动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因为,将生育间隔这一因素考虑进来,在比较农村本地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生育水平时,两者由所受时期进度效应不同产生的误差将会被消除。

二、数据与方法

(一) 数据库基础

对于一个有着详细的妇女生育史记录的数据库,可以进一步分析生育间隔年数别生育率。我于此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中的成人问卷数据库与国家卫生计生委组织实施的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项目中的“2014年全国个人A卷”数据库作为研究基础来分析。关于两个数据库抽样代表性评